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题名汉译谈

申晓亭

在我国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有着蒙古民族不平凡的历史和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千余年的蒙古族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蒙古文古籍文献。这些古籍文献具有文字独特、内容丰富、历史价值高等特点。《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收录了1949年以前我国用蒙古文刻写印刷的图书、经卷、档案、金石拓片、期刊等近一万三千余种文献资料目录，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蒙古文古籍目录，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蒙古文古籍的全貌。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是用少数民族文字本身进行著录的少数民族古籍目录，它采用国家文献编目规则进行标准著录，同时考虑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和国内外的需要，对其题名进行汉译和拉丁转写。《总目》题名汉译工作有相当大的难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书名翻译难。书名翻译与一般翻译相比，它的要求更高，也就更难做。首先，书名是一部书的第一信息，具有着第一重要性，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掉以轻心。其次，书名本身既反映了书的内容和特点，同时又是高度浓缩和精练的，书名的翻译也需要具有同样的性质。第三，书名作为一部书的外在标识，它需要有文雅的装扮，就像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一样。第四，书名难译还在于它一旦被译出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很强的实用

性。它将引导千百万人去读书，也将被千百万人所检验。

2. 语言文字难。民族文字难，民族文字古籍中的民族古文字更难。从蒙文古籍中反映出来的古代蒙古文字种类可多达七种：回鹘式蒙文、八思巴字、具有清代特点的蒙文、具有现代特点的蒙文、蒙文阿礼嘎礼、满文式蒙文、托忒蒙文。除古代蒙古语词汇之外，还有许多来自藏语、梵语、汉语的词汇。蒙文古籍中还存在着许多错字、别字和不规范字，这些都给题名翻译造成了许多困难。

3. 内容难。《总目》是个大型综合性的目录，除档案、金石拓片、期刊这些特殊领域外，仅图书部分就分宗教、哲学、政治、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学、医药卫生、农牧科学、工业技术十四大类，细类约 200 项。涉及面非常广，每一类都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没有相当造诣的专业学科知识，想把各个学科的古籍题名翻译得准确，翻译得好是很困难的。

4. 蒙文古籍题名的汉译基础差，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工具书不足。蒙文古籍除少数蒙汉合璧的书上有并列汉文题名外，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汉译名的。1979 年出版的《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中的汉译题名也仅有 1500 余条，而我们现在却有 13000 余条目。由于古籍目录工作基础差，过去的汉译名不准确的也很多。最近几年来虽然也出了几部专业词典，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像《藏汉大辞典》那种规模的包括古蒙文、佛教等名词术语的、方便使用的《蒙汉大辞典》。

《总目》题名汉译工作虽然有这样许多困难，但路是人走出来的，迄今为止，在大家的帮助和共同努力下，13000 条目近二十万字的汉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从工作中我们总结出一个《〈总目〉题名汉译原则》，结合这个《原则》谈一谈《总目》题名汉译工作的有关问题。这里说明一下，谈到翻译会涉及到直译、意译、

信、达、雅等翻译理论问题，由于翻译的对象不同，翻译的实践不同，可能会对这些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我现在所谈的仅是从《总目》题名汉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适用于《总目》题名汉译的一些理解和解释。

—

先谈谈直译与意译。

直译，我的理解，它并不是元代白话文式的硬译，仍需要在对原文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按照汉语的语言原则去进行表达，必要的语法、修辞上的调整是免不了的，只是相对意译而言不做大幅度的改动和增减，比较地忠实原文字。直译是本《总目》题名汉译的主要方法，特别是那些特殊专业部类，如宗教部分、档案部分，多采用直译的方法。

意译，一般来说是指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旨在译出其中的涵义，而不多受原文的限制。《总目》中的意译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比如，根据汉译书名的习惯，对某些较长或修饰词较多的题名择其关键词摄其要旨进行翻译。例：“蒙古源流”，原文直译为“诸汗源流珍宝史纲”；“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传略”，原文直译为：“胜自在一切智金刚持达赖喇嘛罗桑格桑嘉措传述略如意树宝穗”。这两个例子都是略去了修饰词。又比如，由于原题名或不完整，或不准确，或表意不明等原因而对其进行有根据的补充和修改。例：《俺答汗传》最早版本的封面题名直译为“宝贝精义”，但是根据内容和其他抄本的题名仍将其译为“俺答汗传”。又例：“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传”，原文直译为“依胜自在圣呼毕勒罕宝身佛教众生之怙主获无误真实道圣迹日导引经”，该题名表意不明，所以根据内容将其译为：“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传”，等等。意译一般会对原文进行较大幅度的增减和修改。意译容纳了“约定俗成”，上述“蒙古源流”、“俺答汗传”的翻译也是约定俗成的一种

体现。直译和意译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就准确而言也不能厚此非彼。比如“蒙古源流”一名，虽然它与题名文字略有出入，可我认为它译得很准确，它反映了书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有所依据的，木刻版《蒙古源流》的书口题名即为“mongYol qad-un eki ündüsün”。在实际工作中哪些书的题名直译，哪些书的题名意译，则是根据不同类型书的具体情况而定，意译多出现在历史、人物传记、文学部分。

二

其次，谈谈“信、达、雅”。前人对翻译工作总结出来的“信、达、雅”三个字，我认为是很精辟，很有指导意义的。《总目》题名汉译的基本原则就是“信、达、雅”，其中“信”是第一位的，是“达”和“雅”的基础。“信”就是要准确，那么什么才叫做“准确”呢？本文从四个方面谈及。

一、《总目》题名汉译原则规定：“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译名要努力做到与题名文字和书的内容两相符合。”“与题名文字相符”这句话很容易理解，但实际做起来却很不容易，这里涉及到许多语言学和翻译学的问题。首先要对蒙文题名的词义、语法、语境、潜在语义等有透彻的理解，其次对汉语的词汇、语法、修辞等也要有相当的造诣和熟练的驾驭能力。蒙语文是独具特色、相对较难的一种文字，文字上一字多音，语法关系上有时也很容易出歧义，再加上古代蒙古语及专业术语等因素，许多题名译起来都不轻松。随便举一个例子，宗教部分有一条目，蒙文题名按照字面直译为：“吉祥长寿威猛炽火金刚手成就法及秘密甘露海”。仔细推敲内容及参考其他条目发现有一些不妥的地方。“金刚手”一词应该往前提，“吉祥金刚手”是一个紧密结合的词组，是一个本尊的名称。这个题名的中心意思是：“（依）吉祥金刚手（修）长寿成就法”，而句末的“秘密甘露海”是前部分题名的修饰，不是

并列成分，所以“及(jīci)”一词在译文中应该减去。这个条目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吉祥金刚手长寿威猛炽火成就法秘密甘露海”。这样译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呢？也不见得，也许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从内容和修辞两方面考虑是否译作“吉祥金刚手威猛炽火长寿成就法”更好一些呢？没有把握，暂时按原语序翻译。这类因语序而引起的理解问题在翻译中是经常遇到的。比如，“密中密愤怒明王现证法”，根据内容似乎应该译作“愤怒明王密中密现证法”；“秘密成就马头明王法门”，参考其他条目似乎应该译作“马头明王秘密成就法门”等等。

以上可以说是辨别句义、短语义，还有一类是辨别字义、词义。《总目》题名中有一些不规范字，如：宗教部分某条目中有一词，原文写的是 quuri (或 qoori)，那么这是个什么字呢？蒙文“毒”字为“qoor-α”，“雨”字为“qur-α”，从字形上看它比较像“毒”字，但从前后文意义理解还是“雨”字比较合适，译出来是“天龙八部降雨法”。又比如：对“itegel”一词，要辨别什么时候译作“皈依”，什么时候译作“怙主”等等。总之，“与题名文字相符”要有对文字和内容两方面的透彻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与题名文字相符”是指要符合题名这个小的语言环境，作为书名它是整部书的提纲挈领，还应该考虑书的学科内容这个大的语言环境。因为词是有多义性的，不同的学科内容对词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dürben ündüsün”这个词组，如果在医学类它就是“四部医典”，到了宗教类它则是“密宗四续”；“ündüsün”一词，在宗教类常被译作“本续”，到历史类则常被译作“源流”。不同学科内容的书名在修辞上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üligel dalai”一词，在普通文学中译为“故事之海”，在宗教文学中则译为“譬喻之海”；同是“silüg”一词，在普通文学中译为“诗”，在佛经中译为“偈、颂”。就连人名的音译也要考虑被译的对象。比如，

“lobsang”一词，一般人按蒙语的规律译作“罗布桑”，如果是活佛或名僧可能就要按照藏语的规律译作“洛桑”。所以我们提出，题名汉译的原则是“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译名要努力做到与题名文字和书的内容两相符合”。

二、《总目》题名汉译原则规定：“从汉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应还原为原有的汉文题名。寺庙名、人名、官名、地名、衙署名等专用名词应采用历史上汉文固有的名称。”这些都是需要许多知识、很艰巨、很细致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尽可能地查阅有关的工具书，请教专家学者，使这类译名有所依据，达到上述要求。

1. “从汉文翻译过来的作品应还原为原有的汉文题名”，这一条对于某些众所周知的作品来说并不困难，如：“金史纪事本末”、“三国演义”等等。但是对于某些鲜为人知的作品就十分困难了，特别是用蒙文音译汉文题名的作品。比如，档案部分有一条目蒙文为“daicing ulus—u jing sing bötön sudur”，开始我把它译作“大清进奉全书”，认为是有关纳税进贡的书。后来得专家指教，汉文有一部“大清缙绅全书”，经仔细斟酌内容确定其为“大清缙绅全书”。又比如，“升仙传”一书，蒙文原文有“seng siyan juwan”和“sen siyan juwan”两种写法，而汉文书籍又有“升仙传”和“神仙传”两种，到底是一种书还是两种书？是“升仙传”还是“神仙传”？通过查阅内容确定其应为同一种书，同时书中有济小塘的故事，应该是“升仙传”。类似这种蒙文音译汉文的题名，有一些是有据可查的，还有一些是经过努力仍然无法还原的。比如文学类的“安乐明”、“安顺”、“马第臣”之类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而“全缘楼”、“双钗记”之类译出来像那么回事，可又没有确实的书籍可以对证，只好抛砖引玉了。这类问题主要出在文学类，粗略统计这类书约60种，其译名2/3是有证可查，还有1/3没有十分把握。

2. 人名、官名、地名、衙署名的翻译大多数都核查了相关的历史资料，有一定的依据。从《理藩院则例》、《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可以得到当时的盟、旗、官、衙、王、公的名称。从《归绥道志》、《蒙古鉴》、《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等有关史料中可以得到相关的历史资料。例：档案部分一条目译名为“大中华民国和谈外蒙古事务全权专使都统衙毕桂芳、少卿衙上大夫驻墨西哥国特命全权公使陈策致自治外蒙古政府全权专使司法副长额尔德尼济农贝子希尔宁达木丁、财务长土谢图亲王察克都尔扎布函”，如果光凭蒙文题名的音译记录，这些官衔名、人名是绝对译不出来的，这是核对了记录在《蒙古鉴》一书中的有关恰克图条约的汉文原文而译出来的。同时在翻译中我们也注意到同一个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名称。比如：“理藩院”这个机构在清代时称“理藩院”，清末时称“理藩部”，民国初 1912—1915 年称“蒙藏事务局”，1916—1928 年称“蒙藏院”，1928 年以后称“蒙藏委员会”。蒙文同是“呼和浩特 (kōkeqota)”，汉文在清代称“归化”，在民国称“归绥”等等。

3. 寺庙名是最不可马虎的，因为它几乎是不能“自译”的，必须采用它本身曾经拥有的汉文名称。所以在译寺庙名时十分谨慎，尽一切可能查证寺庙原有的汉文名称，实在查不到的，短的一般给予音译，长的进行意译时加方括号 [] 以示区别。粗略统计《总目》中寺庙名约有 80 个，自行意译的不到 20 个，音译的 10 余个，其他都是查有出处的。遇一寺多名时可酌情进行取舍，必要者在附注项加以说明。例：包头附近的 $\alpha\gamma u u$ yeke onoltu süm-e (这是古籍文献上出现的名称)，依清廷赐名译为“广觉寺”，并在附注项说明：“广觉寺”又名“五当召”或“巴达格尔召”。

4. 人名的翻译。这里主要指的是蒙古语人名的汉字译音。这类翻译在《总目》中出现频率还是很高的，仅档案一类人名的出现率就大约有一千次。实践证明，在这种文献工作中如果没有一

个统一的译音规律，就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一时，彼一时，译名纷乱多变给读者造成混乱。在工作中，我根据清乾隆六十年编制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的译音规律，总结出一个《〈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蒙古语汉字译音基本规律表》。在这个基本规律下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①涉及到中世纪的蒙古人名一般采用中世纪的译音规律，例：“孛儿只斤 (borjijin)”、“孛斡儿出 (boyurji)”等。②民国时期的蒙古人名一般采用该译规律进行翻译，有名人物可沿用当时已有的汉译名，例：“塔旺布理甲拉 (lhawangbörögjil)”、“图布升吉尔嘎勒 (tüdsinjirγal)”等。③僧职人员的人名基本上按照蒙文的发音习惯进行翻译，例：“罗布桑”、“扎木素”、“扎勒森”等；但对于有名望的活佛、僧人则按照已有的、藏文的发音习惯进行翻译，例：“七世达赖洛桑嘉措”、“四世班禅却吉坚赞”等。

三、有关《甘珠尔经》篇目题名的翻译。蒙古族信仰的是藏传佛教，蒙文的佛经也多是译自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丹珠尔》两个部分。《甘珠尔》为佛说，大致相当于经、律、论三藏中的经部和律部中的佛说部分；《丹珠尔》为“论”，相当于经、律、论三藏中的论部与律部中的非佛说部分。清康熙年间刊印藏文《甘珠尔经》时，有四体合璧《甘珠尔目录》，该目录近年来被重新整理出版，可以利用，以下简称“清译”。另一方面，汉译《大藏经》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虽然它不是藏传佛教的体系，但许多经是共同的。所以在翻译《甘珠尔经》时有这样几条规定：

1. “有相应的汉文《大藏经》译名时，原则上采用汉文《大藏经》译名。”当然汉文《大藏经》也有一经多名的，因而我们以日本影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目录部所注汉文《大藏经》译名为主。例：清译为“最胜能除十方黑暗大乘经”，汉文大藏经译名为“佛说灭十方冥经”，这种情况一般取汉文大藏经译名。但也有

个别例外的，例如：清译“最胜大智慧到彼岸千百颂”和清译“圣慧到彼岸万八千颂”，日本影印北京版目录所注汉文大藏经译名都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德格版分为‘初会’和‘第三会’）”，本《总目》将其译为“圣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和“圣般若波罗蜜多一万八千颂”，与清译和汉文大藏经译名都有所差别。粗略统计，这种有汉文大藏经译名依据的近30种，占《总目》《甘珠尔经》散出经卷的1/3强。

2. “没有相应汉文大藏经译名时，原则上依照清代北京版四体合璧《甘珠尔目录》中的汉译名进行翻译。（参见双福等主编的蒙文《甘珠尔经》目录卷）”。例：“佛说七宿星曜经”、“圣无量寿智大乘经”、“圣八明经”等等。这类有清代汉译名和上述有汉文大藏经译名的合起来约占《总目》《甘珠尔经》散出经卷的2/3强，还有近1/3没有找到出处，是自己补译的。

3. “考虑到清译中某些术语现在已经不常用，为了整体译名的统一修改其中几个术语：bilig—ün činadu qijayar—α kürügsen，清译为“智慧到彼岸”，修改为“般若波罗蜜多”；ilaǰu tegüs nōgčigsen，清译为“出有坏”，修改为“薄伽梵”；mandal，清译为“中围”，修改为“曼荼罗”；jang üile，清译为“道场”，修改为“仪轨”等。这就是为什么前例不依清译译为“圣慧到彼岸万八千颂”，而译作“圣般若波罗蜜多一万八千颂”的原因。

《丹珠尔经》是对“佛说”的注疏和阐明，由于目前蒙文经卷中哪些是出于印度人的注疏和阐明，哪些是出于西藏、蒙古本土的注疏和阐明——换句话说即《丹珠尔经》与非《丹珠尔经》，很难加以区分，所以《总目》中《丹珠尔经》的散出经卷是与其他佛教典籍混在一起按照显宗、密宗的体系进行分类的。另外《丹珠尔经》虽然也有清代的四体合璧目录，但至今没有整理出版，不方便使用。所以，《总目》中《丹珠尔经》散出经卷的翻译基本上没有考虑清译，而是同其他经卷一起，以后人的有关翻译为主要

参考的。

四、《总目》题名中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名词术语，翻译这些名词术语，一是要有依据，有出处；二是要统一。宗教部类的名词术语尤其为多，这里举几个很常见又费斟酌的例子：

1. 优婆提舍，蒙文 *ubadis*，来自梵文 *Upadesa*。《佛学大辞典》解释：“此译论义，以理法论义问答之经文也”；《藏汉大辞典》解释：“口诀、窍门、秘法、门路，梵音译为优婆提舍，佛书译为教授”；《蒙古语大辞典》解释：“法术、说教、卜筮”。汉文经书中常将其译为“优婆提舍”，藏文经的汉译中又将其译为“教授”。从蒙文佛经的应用看，该词兼有“论义”和“秘法”两个含义，本人在《总目》中将其统一译为“优婆提舍”。例：“大圆满智慧自解脱优婆提舍”、“语优婆提舍”、“能断优婆提舍最胜金鬘”、“除垢优婆提舍”等。

2. 护摩，蒙文 *Yal mandal* 或 *tülege öglig*，来自梵文 *Homa*。《佛学大辞典》解释：“译为烧”；《藏汉大辞典》解释：“火供，烧施，梵音译作护摩。燃烧有浆树枝等进行的火祭。”

3. 羯磨，蒙文 *üile*，来自梵文 *karma*。《宗教词典》解释：“梵文 *karma* 的音译，意译为‘业’或‘办事’，佛教名词。指僧团按照戒律的规定处理个人或僧团事物的各种活动”。

4. 放咒，蒙文 *sor qayaqu*，相应藏文为 *zor'hphen'ba*。《藏汉大辞典》解释：“放咒，宗教徒在某一物体上诵咒，然后向一定方向抛去，以驱策鬼神，诅咒敌人。”

5. 回遮，蒙文 *qariYulγ-a*，相应藏文为 *phyir'bzlog*。《藏汉大辞典》解释：“驱逐，佛书译为回遮、转还。”

6. 救脱轮回界，蒙文 *orcilang-un töb-ece getülgegci*。是参照《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文典籍文集类目录》（以下简称《藏文典籍目录》）第二册中五世达赖文集相应条目而翻译的。

7. 灵器，蒙文 *dungli*，相应藏文为 *mdos*。《藏汉大辞典》解

释：“灵器，供施代替品”；《蒙古语大辞典》解释：“献给神灵的偶像。”

8. 导引，蒙文 küdelburi。《藏文典籍目录》二世章嘉文集中将其翻译为“导释”，四世班禅文集中将其翻译为“导引”，本《总目》取“导引”之译。

9. 本续，蒙文 ündüsün，相应藏文为 rgyud。《藏汉大辞典》解释：“①传统、系统，旧译相续。……④族类，种属。⑤密宗，佛教密乘。旧译为续，本续。梵音为坦特罗，佛教密乘及有关密乘等经典书籍”。

10. 酬愿，蒙文 qangyal，相应藏文为 bskang'bshags。《藏汉大辞典》解释：“酬忏，酬谢神佛，忏悔罪过的仪式。”四世班禅文集（《藏文典籍目录Ⅱ》）将其译为“酬供”。在蒙文佛经中常与“愿望”一词合用，本《总目》将其译为“酬愿”等等。

这些名词术语的翻译都是有其或梵文、或藏文、或汉文的依据的。粗略统计《总目》宗教部分这类名词术语有几百个。历史、文学等其他类目也不乏有需要统一的名词术语，例：管旗章京、佐领、参领；对答词、训谕诗等等。

当然，名词术语的统一也不是绝对的，对于某些多义词还是要根据语境酌情处理。比如蒙文 jasal 一词就有以下多种翻译：“妖魔对治”，“常见病治疗”，“八卦方术集略”，“病死尸三禳解法”等。

三

以上从四个方面谈及了“信”，即题名翻译的准确性，下面再简单谈一谈“达”。“达”，一般来说就是融会贯通，具体到《总目》中即：“在准确的基础上可以做某些变通。”前面谈到的“意译”就是融会贯通，“达”的一种表现。这里再谈谈有关的另外三条规定。

1. “题名文字表达不明确时，可以根据附注项或著录书的内

容或考证得来的结果给予补充。”例：宗教部分有一条目，蒙文题名原文只有一个字“愤怒”，根据附注项所记录的结束语补充汉译名为“秽迹愤怒明王羯磨会供”（经卷的结束语中经常重复叙述经的题名，但有时与封面和卷端题名不尽相同）。除了这种个别条目的补充之外，普遍加以补充的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在档案部分将“某某某函”做为正书名处理，而将“致某某某”做为说明文字处理，汉译名则将其补充完整，译作“某某某致某某某函”。②伊盟的档案中往往没有写清楚是哪一个旗的札萨克王公，汉译名将其补充进去。例“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札萨克多罗郡王巴宝多尔济等致右翼后旗札萨克固山贝子敦多布色棱等函”。③以书的开头作为题名著录的，可以根据书的内容补充汉译名。④经考证后补充题名中记录不完整的人名。例：“主席傅”补充为“主席傅作义”；“都统马”补充为“都统马骥”等。⑤补充寺庙所在地。例：“茂明安旗甘丹敏珠尔寺”。

2. “一书有多种蒙文题名，酌情取其规范的、常用的题名做统一的汉译名，保留一书多名时，在附注项加以说明。”在蒙文古籍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种书，或由于刊刻版本不同，或由于经过多次传抄，它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题名。比如：《蒙古源流》有七种不同的蒙文题名；《善语宝藏》有十一种不同的蒙文题名（译出如下：①善语宝藏、②善语宝藏苏布喜地、③善语宝藏之智者辩相第一品、④宝藏苏布喜地、⑤善述宝藏、⑥名宝善藏之善语经、⑦宝贝苏布喜地、⑧善述宝藏苏布喜地、⑨名宝藏之善语经、⑩善述宝贝经、⑪善述宝贝苏布喜地）；《龙树所著大誓愿阶》的题名有八种不同的写法；《中阴救难祈祷》的题名有四种不同的写法等等。如果把这些题名一一译出很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解，以为它们是不同的书，而不是同一种书；也会使汉译名显得十分混乱。所以，在确定它们确实是同一种书以后（比如宗教部分加了小标题的），酌情将其汉译名统一。

3. “一书存在有多种被认可的汉译名，取其准确、通用的一种，其他译名有必要者可以在附注项加以说明。”例：《善语宝藏》一书，在附注项注明：“汉译名又作‘萨迦格言’或‘苏布喜地’。”可是，《蒙古源流》一书虽然蒙文题名很多，但从汉译名来说，无论是“印藏蒙白史”也好，“珍宝史纲”也好，都没有被认可，被认可的只有一个——“蒙古源流”。

四

最后，再谈一谈“雅”。“雅”是指译名的文字要雅驯，不仅要译得准确，还要译得好听，好看。在语言简洁、明确、规范的基础上要斟酌文字，注意修辞表达。首先是斟酌用词，要选择最恰当的用词。比如：baɣatur，译“勇士”，不译“英雄”；erke-dür quriyaɣci，译“调伏”，不译“纳入权力”；ɣaɣar-un ejen，译“地祇”，不译“地主”；altan neng qailumal，译“最赤金”，不译“最熔金”；sirα caɣasutu ebkemel，译“黄卷宗”，不译“黄纸卷”等等。其次要斟酌句法，句子要通顺，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比如：一题名直译为“咱雅班第达罗布桑普梭列得道自传明鉴”。但是这样译，从汉语来说总觉得不顺，若稍微变动一下，成为：“咱雅班第达罗布桑普梭列自传得道明鉴”，就好多了，而且也不违反原意。作为书名，我的感觉是有时采用宾谓倒装句更好一些。比如：“魔障褰除经”、“五宗对治法”、“口孽回遮”、“苦难解脱经”等等。题名末尾的“经（三藏中的‘经’严格定义为‘佛语’，这里的‘经’是佛教典籍的泛指）”字，有时也看修辞的需要，比如“绿度母经”，就是加上好，而“绿度母祈祷”，就可以不加了。

在斟酌词句的过程中，还要尽量进行民族性、学科性、历史时代性的修辞润色。也就是说要译什么像什么，要说行家话，用不同的修辞去表达不同内容的不同特色。说到民族特色，非必要的、非不得已的、太多的音译不等于是民族特色。太多的音译会

使人读起来、理解起来都十分吃力，而且破坏了汉语本身的协调性。比如，有一部著名的语法书，以前曾译为：“鄂突尔贵嘛呢”，不懂蒙文的人就很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现在译为“蒙文启蒙诠释苍天如意珠”，既表意明确又不失原文的文采。在题名的主要部分之后加上修饰词语，这是蒙藏文经卷题名的普遍特点。如：“智慧之源”、“水晶鉴”、“珍珠鬘”、“降悉地甘霖”等。这些修饰词语除了语言修饰作用之外，还是区别题名的重要标识，甚至有的就以其修饰词著称。比如：叫做“蒙文启蒙诠释”的文法书可以有好几种，但是叫做“蒙文启蒙诠释苍天如意珠”的只有一种；而且该书确实以“苍天如意珠”著称。这里顺便说一下，藏文经题名汉译时采用了在主要部分与修饰词之间加圆点以示区别的方法，《总目》题名汉译没有采用这种方法。一是因为《总目》不是单纯的经卷目录，是个综合性的目录，内容比较复杂；二是因为《总目》采用标准著录，圆点是合刻书名的标识符。

有关修辞的学科性和历史时代性，前面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再举几个例子：祝词、对答词、箴言、训谕诗等是文学类的行话；袭爵、袭职、诰封、告文、道、厅、衙门等是历史类的行话；众生、本尊、护法、菩提、次第、瑜伽、随许、加持、成就法、往生等是宗教类的行话。总之，译得准确不容易，译得好更不容易。

以上围绕着直译、意译、信、达、雅几个方面粗略地谈了一些《总目》题名汉译的情况，实际上如此难度的一万三千条题名的汉译并非是万把字所能够讲清楚的，具体做起来比上面所谈的又要复杂得多。规范性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是主要方面，同时也存在某些不规范的地方，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比如：有些难解词从梵文、藏文、古蒙文都无从查找，这些词可能是偏僻的术语，也可能是误写、误抄；有些题名表意不明，难以理解而又因条件所限未能查阅原书

等等。遇到这些问题，有的只好回避，有的只好以模糊对模糊，有的只好抛砖引玉了。值得庆幸与感谢的是，《总目》题名汉译工作曾经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心指教与帮助，并期待着更多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希望《总目》的题名汉译能够伴同《总目》成为献给蒙古族人民的，献给我们中华民族图书馆事业和世界文化的一份厚礼。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少数民族文献组

（上接 89 页）

④新华社银川（1996 年）11 月 14 日电：《木活字印刷术发明年代提前一百年》；刘长宗、庄电一：《宁夏发现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光明日报》1996 年 11 月 17 日。牛达生：《人类印刷史上的重大发现—西夏文佛经〈本续〉认定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台湾《1997·中华印刷科技年报》，中华印刷科技学会 1997 年 3 月初版。

⑤《修持仪规》《众经集要》二种写本，在注③《记要》中写为《是树橛咒》、《华严经》，本文所用名称是根据方广钊先生的考订修正的。

⑥方广钊：《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待发）。该文中对缝缀装多所论述，笔者深受启发，谨致谢忱。

⑦牛达生：《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说》，《宁夏大学学报》1999 年 3 期。

⑧（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导言》57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版。

⑨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中华印刷通史》古代篇《西夏的刻书事业》，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 1998 年 10 月初版。文中涉及部分为笔者撰写，见 193 页。

作者工作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所